

【译 文】

西藏在中美关系的角色¹

谭·戈伦夫 (Tom Grunfeld) 著²

郑惠元译³

简介

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代表了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中美关系存在许多的维度而且相当复杂。

自从 1972 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后，双方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在 30 多年的彼此仇视之后，双方直至 70 年代才开始慢慢了解彼此，1979 年实现了外交正常化，在 80 年代曾经双方联手对抗苏联。在之后的 90 年代，则因为受到 1989 年 6 月发生在北京的事件而导致双方关系急速降温。到 2000 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大国，这使双边关系的情况再次发生变化。今天，尽管紧张和分歧仍然存在，但双方自 2009 年开启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似乎见证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基础⁴。

有一次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告诫他的同胞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⁵

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但与此同时，却也是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四十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最主要的争论点一直是在政治领域。自从 70 年代以来，每一任美国总统的挑战者都批评现任总统的对华政策将危害美国。然而，当每个挑战者最终赢得总统选举后，他们都会忽略他们先前做出的承诺，并与他们前任总统一样继续实施一贯的对华政策，仅仅做出一些细微的改变。⁶

2011 年 1 月 19 日，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结束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胡锦涛主席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¹ 本文为作者在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2012 年 8 月）上的发言，译成中文发表得到作者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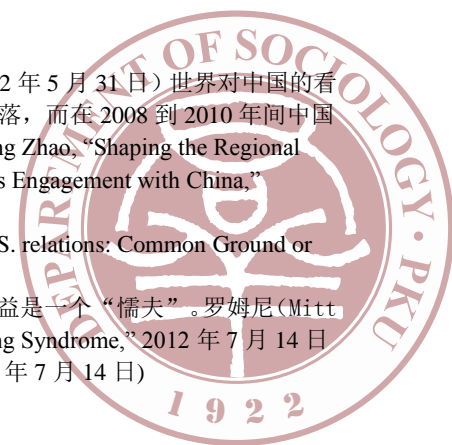
² 谭·戈伦夫 (Tom A. Grunfeld)，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学院历史系 (Empire State College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教授，是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E. Sharpe, 1987, 1996) 的作者，该书第一版的汉文版由伍昆明、王宝玉翻译，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³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2 级博士研究生。

⁴ Douglas Paal, "U.S.-China Ties Survive Stress Test," *The Diplomat*, 11 May 2012. <http://thediplomat.com/2012/05/11/u-s-china-ties-survive-stress-test/> (浏览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快速地转变是在 2008 年，当时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如自由落体般滑落，而在 2008 到 2010 年间中国则肩负起世界经济成长的 40%，这对权力转移向中国是十分有利的。Suisheng Zhao, "Shap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 How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Back Hedge in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2) 21:75, 378.

⁵ 引述 Zhang Jiadon & Zheng Xin, "The Rol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China-U.S. relations: Common Ground or Contradictory Are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2) 21:76, 624.

⁶ 克林顿指责老布什“溺爱独裁者”，而美国总统奥巴马指责小布什为了中国利益是一个“懦夫”。罗姆尼 (Mitt Romney) 指责奥巴马是“几乎是到北京要饭的。”Lexington, "The China Bashing Syndrome," 2012 年 7 月 14 日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8581?frsc=dgla> (浏览于 2012 年 7 月 14 日)



……（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建立一个积极、合作、全面的美中关系以面向 21 世纪，这符合美国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利益，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的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在该地区为和平、稳定与繁荣所做出的贡献。¹

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称：“奥巴马总统和我已经说过多次，美国认为，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繁荣的美国也有利于中国。”²

然而，在所有的这些公开表态后双方仍然存在严重的地域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源自于双方之间缺乏互信，当然，也不仅局限于此。双方争论的具体议题包括：经济和军备的不均衡发展，中美在台湾、西藏等关键问题上的分歧，美国派遣到西太平洋的军力，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不平衡、货币汇率政策、网络攻击和其他更多的问题。双方之间呈现的不均衡关系正在不断深化，不仅影响中国的对美关系，这些议题上的分歧也严重地影响着美国的对华关系³。

本文将探讨这些争议问题之一即西藏问题。尽管目前西藏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仍处于相对温和的状态，但它仍然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引爆点。

“（美国）应妥善处理台湾、西藏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代表了中国的核心利益”，2010 年 4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特别警告说，“这是中美关系的关键。”⁴

历史

美国对西藏的接触在早期仅仅是表面上的。美国与拉萨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 20 世纪初，当时美国探险家、学者、作家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刚刚开始探寻这些藏人居住区。但是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华盛顿和拉萨之间并没有任何其它接触⁵。

近半个世纪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失去了中国西部位于滇缅公路上的物资供给线。虽然飞机可以被用来跨越印度的喜马拉雅山（圣母峰）运送物资，但由于其效率过低，无法充足供应。另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印度平原北部的陆路来进行运输。为了了解这条路线是否可行，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CIA]）曾派遣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 Tolstoy）上校和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中尉来执行此项任务，以确定这条路线能够作为圣母峰航线的补充。他们自 1942 年 12 月至 1943 年 3 月期间访问了拉萨。

虽然他们的使命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的效益，但他们是第一个官方认可的访问西藏的美国代表团。他们甚至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礼物带给当时年仅 7 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⁶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对西藏仍然没有什么太大兴趣。作为国民党（GMD）的盟

¹ “US-China Joint Statemen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19/us-china-joint-statement> (浏览于 2012 年 6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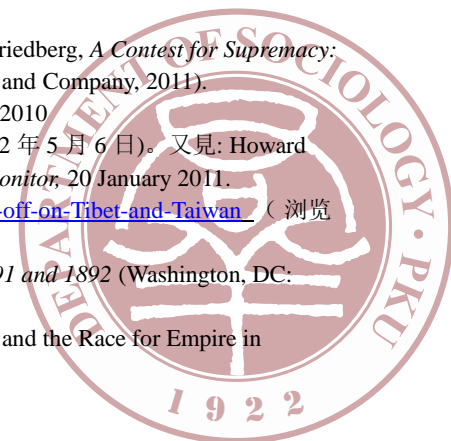
² 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基本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及紧张会导致冲突。见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NY: W.W. Norton and Company, 2011).

³ “Properly handling Taiwan, Tibet issues key to Sino-U.S. relations” *Xinhua*, 2 April 2010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04/02/content_13288507.htm (浏览于 2012 年 5 月 6 日)。又见: Howard LaFranchi, “Hu Jintao bristles: Back off on Tibet and Taiwa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 January 2011.

⁴ <http://www.csmonitor.com/USA/Foreign-Policy/2011/0120/Hu-Jintao-bristles-Back-off-on-Tibet-and-Taiwan> (浏览于 2012 年 6 月 1 日)

⁵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894).

⁶ Karl E. Meyer and Sharen Blair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NY: Counterpoint Press, 1999), pp. 397-424.



国，（美国）认为西藏在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战争结束后，理所当然应该归还给中国。而美国官方外交政策也支持这一立场。1943年，华盛顿当局响应英国请求的同时，首次表达其官方立场：

就其本身而言，美国政府一贯承认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声称其拥有西藏宗主权的事实，且中国宪法开列的构成中华民国领土的区域中也包括了西藏。关于这些诉求，本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疑问。¹

不过，随着冷战开始和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在中国内战中获胜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引起了美国对西藏的兴趣。毛泽东宣称，西藏是一个需要被解放的地区。

美国与中国的交往被美国对中国进行的外交和经济封锁所切断。此外，在随后的三十年间，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多次秘密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的地点从缅甸一直延伸至西藏。有间接证据表明，美国还曾组织了额外的军事行动，但相关的证明文件至今仍未解密。

1949年11月19日，美国外交代表团在新德里会见了西藏政府代表，包括内阁官员噶伦索康（Surkhang）及西藏贵族邦达仓家族（Pangdatsang）中的一名成员。索康对代表团说，美国是“最伟大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西藏唯一的希望²。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Loy Henderson）向藏人表示，美国同情他们的困境，但不能公开表现出任何关心或介入。美国和藏人之间的会谈一直持续到1950年和1951年，由英国传教士乔治·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担任秘密联络人。但是就目前可得到的文件来看，实际上并没有实施援助行动³。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导致双方利益开始趋同。当时美国准备采取行动，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报指出“现在政府部门已经准备好要向藏人保证，美国将再度援助西藏。”这一计划由亨德森告知藏人，美国已经决定“随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和金援。”但这里存在一个障碍——那就是首先需要印度政府同意这个计划。如果印度拒绝直接为藏人提供援助，华盛顿建议藏人直接向新德里（即印度政府）申请，以获准许可运送来自第三方（美国）的援助物资过境印度。当西藏代表孜本夏格巴（Tsepon Shakabpa）得知这些计划时，他立刻试图弄清楚相关援助的类型，他想知道这一援助项目内容是否包括美国军队和战机。但结果是“没有”，藏人所能期待的只有“战争物资和财务支援。”⁴

美国国务院与西藏的秘密一直持续到1952年，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包括：乔治·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噶伦索康（Surkhang Rimshi）和对美国人十分谨慎的夏格巴。而美国外交代表则被送到噶伦堡“度假”，并在家庭的掩护下展开秘密交涉。

此时达赖喇嘛已经逃至亚东，但他听到藏军在昌都被人民解放军（PLA）击溃后，达赖喇嘛最终仍自愿地回到拉萨，而美国把他吸收为“冷战斗士”（Cold Warrior）的努力则以失败告终。

在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前往台湾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商谈的同时，另一个哥哥土登罗布（Thubten Norbu）则飞到美国，接受由中央情报局（CIA）资助的另一个反共组织自由亚洲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Free Asia,）的庇护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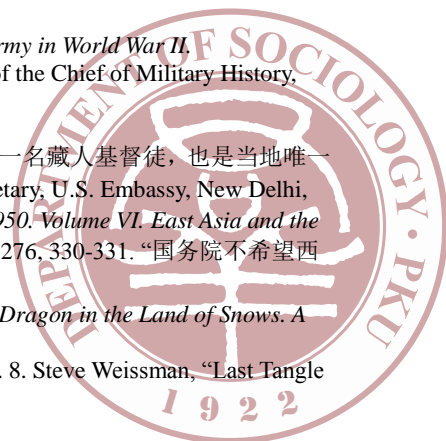
¹ *FRUS, 1943*, p. 630. and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China-Burma-Indian Theater.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p. 287.

² *FRUS 1949*, pp. 1980-1982.

³ 1951年6月7日噶伦堡的谈话的备忘录，邦达仓兄弟之一的 Rev. G. Tharchin（一名藏人基督徒，也是当地唯一藏文报纸《西藏明镜》的编辑），George Patterson and Fraser Wilkins, First Secretary, U.S. Embassy, New Delhi, #3030, 1951年6月14日，由作者解密。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VI.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272-273, 275-276, 330-331. “国务院不希望西藏人误解我们以为我们不关心他们的困境或是缺乏同情心。”

⁴ *FRUS*, p. 376, 378-618. 关于此一时期绝佳的论述，请参考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London: Pimlico, 1999), pp.71-82.

⁵ “Brother of the Dalai Lama Arrives Here to Study,” *New York Times*, 9 July 1951, p. 8. Steve Weissman, “Last Tangle



美国中央情报局

中美关系中，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中央情报局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当它涉及西藏问题的时候¹。十五年以来，面对这个敏感的议题，达赖和他的追随者始终否认与中央情报局存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国指责西藏叛军接受境外势力的援助时，达赖喇嘛反驳说，相关报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²我们可以引述他在1961年所说的话：“叛军拥有的唯一武器，是他们从中国人手中夺下的武器。虽然他们有枪，但有时他们甚至还用弹弓、矛、刀、剑”³。

事实上早在1952年，嘉乐顿珠就从台湾国民党手中接收到了一批武器⁴。大约在同时，他也走进了美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但直至1956年，他并没有直接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具体帮助⁵。在这一年，嘉乐顿珠首次安排中央情报局组织的训练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挑选了六名藏人成立了第一支队伍。

1956年时，中国境内的叛乱如雨后春笋般在西藏东部（四川康区）出现，当地藏民开始反抗中国政府在该地区的政策，而中央情报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并企图给北京政府在这一地区制造麻烦。

中央情报局开始训练、装备并鼓动西藏叛变。中央情报局专属的航空公司——民航空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从塔克里基地（泰国曼谷以北）开始长期执行往返飞行任务。来自波兰和捷克的雇佣飞行员们从美国蒙大拿州派来执行空降任务。自1957年到1961年，空投到西藏的装备超过250吨，包括武器、弹药、无线电通讯设备、医疗用品、手动印刷机和其它物品⁶。

1958年，美国在科罗拉多州的霍尔营（Camp Hale, Colorado）建立了一个训练基地，在接下来的6年里，约有170康巴人在该基地接受培训。

1959年初，叛乱从康区向西蔓延到了拉萨。关于1959年3月达赖喇嘛是如何逃亡的，至今仍然笼罩在谜团之中⁷。

但是随后西藏境内的反叛活动却进展得并不顺利。1961年，最后一批康巴人被空降到西藏。自1957年以来，在查到有具体记录的49名男子当中，只有10人活着离开了西藏，1人投降，1人被捕，其余阵亡⁸。

中央情报局也开始实施新的项目，在莫斯塘（Mustang）建立了藏人游击队营地，莫斯塘位于尼泊尔北部边境一个小小的半岛形的半自治土邦里，毗邻西藏。

in Tibet,” *Pacific Research and World Empire Telegram* 4:5 (July-August 1973): 1-18. Steve Weissman and John Shock, “CIA Asia Foundation,” *Pacific Research and World Empire Telegram* 3:6 (September-October 1972): 3-4. David W. Conde, *CIA-Core of the Cancer* (New Delhi: Entente Private, 1979), pp. 111-115

¹ 虽然这些资料的准确性远远不够，但这是从当时参与中情局行动者所提供的最佳数据。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NY: Public Affairs, 1999).

² *Asian Recorder*, 6:30 (1959), 2785-2786.

³ “The Red Terror in Tibet: Interview with the Dalai Lama,”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4 April 1961, p.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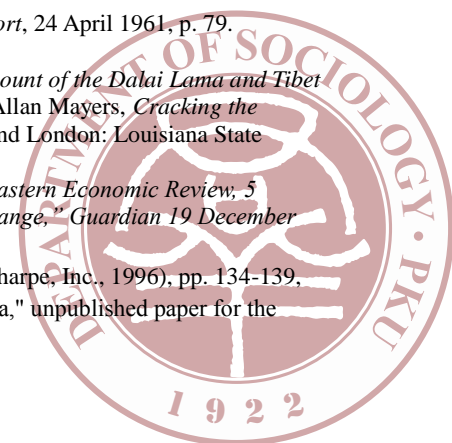
⁴ Knaus, p. 136.

⁵ *Ibid.*, p. 138. John F. Avedon,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The First Full Account of the Dalai Lama and Tibet Since the Chinese Conquest*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1984), p. 47. David Allan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U. 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55* (Baton Rouge and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8-87, 95.

⁶ Knaus, p. 147, 154-155. 25. Chris Mullin, “The CIA: Tibetan Conspirac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5 September 1989, p. 33. George Patterson interview. T.D. Allman, “Cold Wind of Change,” *Guardian* 19 December 1973, p. 11.

⁷ A. Tom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Armonk, NY/London, UK: M. E. Sharpe, Inc., 1996), pp. 134-139, 141-145. 可参考, A. Tom Grunfeld,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1959 Revolt in Lhasa,” unpublished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Tibet: The Ecology of a Culture,” Yale University, October 1992.

⁸ Knaus, p. 233.



在美国支持下，印度政府开始全面协助设立藏人武装部队，称之为“特别边境部队”（the Special Frontier Force）。最终，12,000名藏人受到美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s）的训练，他们的部分活动经费由美国提供。这些人曾沿着克什米尔边界越境进入西藏安装电子监听系统¹。

早在1964年，印度和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联合行动中心来督管尼泊尔莫斯塘营地的情况。由美国提供物资和资金，藏人提供人员，而印度则“控制这一地区的领土和行动”（controlled the territory and therefore the operations）²。从1964年至1967年，共有25支小组被派遣进入西藏，但极少获得成功，因为他们发现很少有藏人愿意支持他们³。

到了1969年，这一行动仍然没有展现成效，因此中央情报局决定结束“莫斯塘行动”，但该行动的终止时间曾几度短暂延期。随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1971年秘密访问北京，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突然改变，其结果是该地区的秘密行动最终结束，莫斯塘营地的藏人们被他们最依赖的国家所背叛，必须自生自灭⁴。

除了支持一个游击队营地外，中央情报局还开展了其他活动。他们为藏人的各种活动提供赞助，如设立藏人在日内瓦和纽约的办事处，表面上是要促进藏族手工艺品和宣传西藏的事业，但其实是在建立达赖喇嘛的准外交机构。这也是新德里“西藏之家”（Tibet House）的真正功能。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资助（每年45,000美元）几名藏族学生在康奈尔大学读书，为他们在印度达兰萨拉达赖喇嘛流亡政府任职做准备。然后，中央情报局也对达赖本人给予直接资金补贴，从1959年到1974年，达赖每年至少接受18万美元资金供他个人使用⁵。

1978年12月，北京当局开始直接接触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⁶，在达赖喇嘛与北京之间进行了第一轮接触后，1979年8月即达成协议，委派了一个代表团访问西藏⁷。这是1959年事件后的第一个这样的访问团。达赖喇嘛随后也开始周游世界，并第一次正式造访苏联、蒙古和美国，这为他获得更高的知名度（1979年）。其中，美国之行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在这之前的十年里，美国曾屡次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理由是“不方便”⁸。

在此之前，流亡藏人试图赢得第三方支持的所有努力成效甚微。为了避免让那些并不心甘情愿发给达赖入境签证的国家感到尴尬，达赖在印度以外的行程被定调为宗教性质的访问。他自然也会努力把握每一个机会，争取会见当地官员，并向那些政治家们表示，自己的行程不具有政治性⁹。只要有可能与北京达成协议，所有的努力都会朝向这个方向。而当谈判陷入僵局时，达赖

¹ Knaus, pp. 271-276.

² Ibid., p. 276.

³ Ibid., p. 281. FRUS 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Document 342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4-1968v30/d342> (Accessed 6 May 2012)

⁴如同一名中情局官员所说的，“在西藏境内取得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境外的则十分可观...西藏人天生就没有筹划阴谋的能力。”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Document 278.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7/d278> (浏览于2012年5月6日)

⁵ Knaus, pp. 275, 282, 284-285, 287, 3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 pp. 731-7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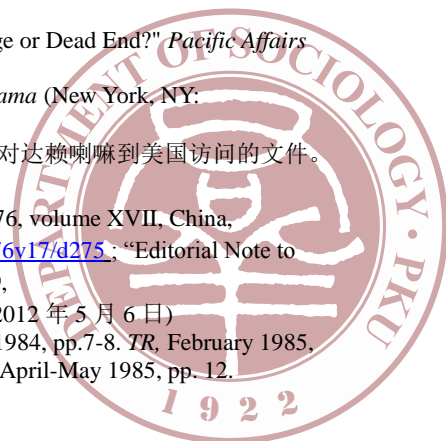
⁶ Dawa Norbu, "China's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1978-1990: Prenegotiation Stage or Dead End?" *Pacific Affairs* 64:3 (Fall 1991), p. 369.

⁷ Tenzin Gyatso, *the 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1990), p. 223.

⁸ TR, 6月1979, pp.8-9. TR, December 1979, p. 14. 参考以下尼克松与福特政府反对达赖喇嘛到美国访问的文件。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Document 278.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7/d278>;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Document 275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1976v17/d275>; "Editorial Note to Document 279"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Document 279,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1976v17/d279> (皆浏览于2012年5月6日)

⁹ *Tibet Review*, (Hereafter TR) May 1984, p. 6. TR, October 1984, p.5. TR, December 1984, pp.7-8. TR, February 1985, p. 5. *Tibetan Bulletin* [Hereafter TB], December 1984-January 1985, pp. 2-3,16. TB, April-May 1985, pp.12.



喇嘛只好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选项。

因此，藏人决定使西藏议题在世界舆论中更加突出，达赖喇嘛利用道义上的理由（独立，宗教自由，环境等）以获得各国民众的支持，使用民众压力迫使各国政府对此表态，达赖喇嘛并以此反过来向北京施压。这些活动由几部分组成：（1）达赖喇嘛前往更多国家，且让这些出访行程更加政治化，（2）在世界各地建立支持藏人的组织，特别是在美国，藉此游说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行动的支持，（3）征求各大国国会议员的支持，最终目标就是希望获得各大国政府的公开支持，（4）鼓励西藏境内公民开展和平抗议，（5）达赖喇嘛继续呼吁北京为谈判提供更具弹性的空间¹。尽管所有这些目标下的各团体与相关活动并不直接与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某个办公室进行合作，某些团体跟这一运动的连结很松散，只是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族自决的主力。

在 1986 年底和 1987 年初，藏人在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召开大会，为的是要建立俗称的“西藏游说行动”（the Tibet Lobby）。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

达赖喇嘛随后也开始积极访问拉丁美洲、经常性地访问美国、欧洲和苏联，会见各国元首、国会议员、教皇。他愿意会见任何人，甚至他曾两次会见奥地利总统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因为瓦尔德海姆早年曾是纳粹分子，因此受到诸多国际领袖的抵制²。藏人在美国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借助对美国国会、白宫有高明游说能力的华盛顿 DC 律师事务所的威利、卡特勒和皮克林，他们在 1985 年 7 月 5 日向美国司法部注册，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专员。”³

这些努力后来也开始有了成果，特别是影响了那些因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权问题、军售、监狱犯人产品出口等问题而对美国十分不满的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们。而西藏游说行动最早的成功事件，是 1987 年 6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修正案，该案谴责在西藏的“侵犯人权”，并声称中国强占西藏。

这也许是个巧合，当 9 月 24 日达赖喇嘛在访问美国时，中国当局在拉萨进行公开审判，处决了 2 名被以普通罪名起诉的藏人。西藏流亡人士声称，他们实际上是政治犯。无论真相如何，三天后拉萨发生了二十八年来第一次的公开示威。随后则是在 10 月 1 日即中国国庆日发生的骚乱，导致了后续的流血事件。

当时正在西藏发生的事件，包括对处决人犯的愤怒，由访问西藏的西方人和流亡藏人所煽动的仇视情绪，以及达赖此时正在华盛顿出访等事实，此时都重叠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藏人对中国政府的敌意。10 月 6 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其内容类似于先前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并增加了附带条款，即将把侵犯人权与未来对华军售捆绑。假若相关军售要继续的话，根据该法案，美国总统必须确定，中国是“真诚且及时地纠正正在西藏侵犯人权的行径”。12 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签署了该项法案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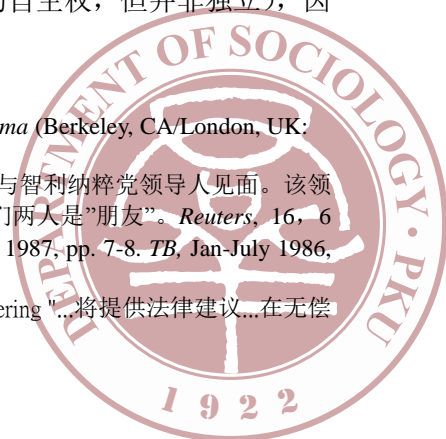
尽管美国提供的支持被流亡藏人广为宣传，但华盛顿关于西藏地位的官方立场并没有改变。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也是后来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以任何方式承认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此外，他接着说，美国拒绝了达赖的五点计划（达赖喇嘛提出西藏要有更大的自主权，但并非独立），因

¹ Melvyn C.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eley, CA/London, U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61-99.

² 达赖喇嘛不仅见了瓦尔德海姆，在 1992 年 1 月，他还拜访智利，并在机场中与智利纳粹党领导人见面。该领导人向记者表示，当他担任智利驻印度大使时，他便与达赖喇嘛碰过面，他们两人是“朋友”。*Reuters*, 16, 6 月 1992. *TR*, 6 月 1986, pp. 6-7. *TR*, September-October 1986, pp. 4,5. *TR*, April 1987, pp. 7-8. *TB*, Jan-July 1986, pp. 2-3.

³ *TB*, p. 13. 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专员登记单位的文件上写到，Wilmer, Cutler & Pickering "...将提供法律建议...在无偿的基础上。" Registration No. 3355, 5 July 1985.

⁴ *TR*, August 1987, pp. 77-9. *TR*, November 1987, p. 11. *TR*, January 1988, p. 5.



为它是“一个流亡政府领导人所提出的政治纲领”，没有政府会承认¹。

与此同时，西藏的骚动仍在继续中，在中国官员们当中，主张限制藏人自由、实施更强硬的压制以及坚决不与达赖喇嘛妥协的声音也越来越强。“对严重罪行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我们必须果断处理、准确和快速地予以打击”。这是1988年3月13日《西藏日报》刊登的一篇社论中讲的，“……他们（这些分裂主义份子）不但是这次动乱的罪魁祸首，也是社会上的毒瘤”²。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要求“政府的政策是对所有反政府武装分子进行无情镇压”³。

而在华盛顿，藏人游说行动的努力开始获得回报。国会参众两院都开始向白宫施压，并通过一系列法案，如：向西藏难民提供50万美元的赠款，对流亡藏人学生提供30所美国大学的奖学金（100万美元），禁止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提出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的法案，以及《美国之声》推出藏语电台广播（自1991年春开播）。

虽然世界各地的西藏游说行动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取得美国的支持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而这些行动在美国取得的成功也最为显著。1991年4月，达赖喇嘛会见了美国国会两院的成员，随后与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W. Bush）和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在白宫会面。在以后的岁月里，也与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副总统戈尔（Al Gore），以及小布什（George W. Bush）和奥巴马会面。政府官员坚称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访问属于“私人性质”。白宫认为，美国国会关于西藏的决议只代表“美国国会”（sense of Congress），对美国政府没有法律效力，也不是美国官方政策⁴。然而，1991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一项国务院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以下（虽然它不具有法律地位）：

美国国会认为，真正意义的西藏，包括以下被中国政府纳入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的部分，[这个更大的藏族居住区]是个被占领的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其真正的代表是被藏人认可的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⁵。

藏人游说行动的巨大成功也使中国政府开始检讨其政策。当流亡藏人寻找媒体来宣传自己的立场，以及举办印度的藏人社区之旅以寻求美国参议员的援助时，中国则禁止记者与美国官员进入西藏，并尽其所能防止美方人员与藏人交谈。这些都导致中国政府对流亡藏人产生相当大的不信任，而且对达赖及其支持者所提出的建议不给予一个确切可行的回应。美国的官方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批评仅仅与侵犯人权有关。其它有关的行动，如：在西藏建立自由亚洲广播电台（RFA, Radio Free Asia），任命一个西藏特别协调员，总统与达赖喇嘛在白宫举行会晤，只是为了安抚美国国内的政治批评。但这些做法，却被中国的强硬派拿来当作证据，指控华盛顿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分裂他们的国家⁶。

¹ “Human Rights Situation of the Tibetan Peopl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87:2129 (December 1987), p. 50. Elaine Sciolino, “U.S. Official Defends Stance on Turmoil in Tibet,” *New York Times*, 15 October 1987, p. A18. 1975年12月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亨利·基辛格、驻华大使老布什和邓小平出席了会议，双方与会者拿达赖喇嘛反对中国统治这件事开玩笑。福特总统说“我向你们保证，国务院副总理先生，我们反对、不支持任何美国政府对西藏的任何行动”。“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Document 137,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1976v17/d137> (浏览于2012年5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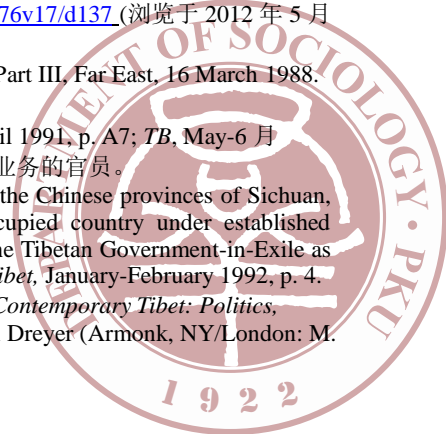
²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Hereafter SWB], Part III, Far East, 16 March 1988.

³ 引自《南华早报》，1988年7月20日。

⁴ Gwen Ifill, “Lawmakers Cheer Tibetan in Capitol Rotunda,” *New York Times*, 19 April 1991, p. A7; *TB*, May-6 1991, p. 16; *TR*, May 1991, p. 6. 作者在1992年3月9日采访了美国国务院涉华业务的官员。

⁵ “That it is the sense of Congress that Tibet, including those are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inese provinces of Sichuan, Yunnan, Gansu, and Qinghai, [areas of greater Tibetan inhabitation] is an occupied country under 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whose true representatives are the Dalai Lama and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as recognized by the Tibetan people.” *TB*, November-December 1991, p. 22. *News-Tibet*, January-February 1992, p. 4.

⁶ 更多详细的历史事件可参考，A. Tom Grunfeld, “Tibet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edited by Barry Sautman and Teufel Dreyer (Armonk, NY/London: M. E. Sharpe, Inc., 2006).



今日的情况

在西藏问题上，华盛顿仍然继续释放出相互矛盾的信息。美国国会和民间社会团体希望在中国境内的藏人至少能够实施更高的自治，最好能够实现完全独立。但是长期以来，即使是在美中关系位于最低点的时候，美国的官方政策一直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由于缺乏共识，导致西藏议题使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化。

无论是谁坐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他都必须回应公众和国会的压力，政客们需要良好的舆论支持，以便使自己重新当选，他们需要国会议员们的合作，以便使法案获得通过。即使白宫具有绝对排它性的外交政策决定权，但美国国会仍然控制了政府的国库，所以白宫很少时候能与国会的执行委员会意见相左¹。

正如上述所言，国会的行动在西藏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在 2009 年 12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美国设立驻拉萨领事馆并在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设置“西藏处”（Tibet Section）²。2011 年 7 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指示国务卿禁止增加中国驻美的领事馆，直到北京允许美国设立驻拉萨领事馆。

每当在国会/舆论和政府官方政策之间出现鸿沟时，总统们便被迫进行棘手的斡旋（delicate dance），这就让我们在这些年看到了双方之间的种种妥协。例如，总统都是在非正式的特殊情况下会见达赖，克林顿总统为了要应对国会压力，在国务院设立了所谓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the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这不是一个全职的工作，每个人都知道这对于中国的西藏政策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力。

这些行动旨在安抚国内的政治批评，同时也企图避免中美关系出现重大分歧。

中国官员的公开声明和中国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似乎缺乏对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的理解，他们不理解美国总统（无论他属于共和党或民主党）必须考虑社会舆论的压力。

另一个刺激因素则是美国的半官方组织如国家民主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向藏人组织提供的资金。这个组织于 1983 年由美国国会创建并资助。当中央情报局实施的“软实力活动”（the soft-power activities）被媒体公诸于世后，政府迫于公众压力取消了中央情报局的相关项目，随后便设立了国家民主基金会来延续这些活动³。

国家民主基金会声称它的宗旨是“促进法治、公民社会和政治发展。”这或许是真的，但它的行为方式很奇怪，因为它的资金极少被用于推动美国的盟国内部的公民社会建设。这种使用资金的模式与中央情报局实施的那些前任项目十分相似。

国家民主基金会自称是“一个私人的非盈利组织”（虽然它获得的全部资金来自美国政府），它在 2012 年收到 1.18 亿美元，其中 200 万美元流向中国（自 1999 年后每年都给予大致的相同数额）以用于“在中国和西藏与民主有关的项目。”

在 2001-2010 年期间，美国通过各种准政府组织把 2.75 亿美元提供给“在中国开展的国际项目，其中 2.29 亿美元专门用于支持法治、公民社会项目及提供给藏人社区。”⁴ 2004 年至 2010

¹ 当美国国会反对美国总统的政策时，总统也发挥必须利用手中掌握的议题才能发挥影响力。

² “US Boost Tibet Outreach with new VVP Lhasa site.” *Phayul*, 18 December 2011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30545&t=1> (浏览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

³ Allen Weinstein 曾协助 NED 起草章程并承认“A lot of what we do today was done covertly 25 years ago by the CIA.” David Ignatius, “Innocence Abroad: The New World of Spyleless Coups,” *The Washington Post*, 22 Sep 1991: C01.

⁴ Thomas Lum, “US-Funded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11 May 2012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p. 4.
<https://www.fas.org/sfp/crs/row/RS22663.pdf> (浏览于 2012 年 7 月 1 日)



年期间，与西藏相关的项目所获得的经费总计为 35,772,000 美元¹。

然而，尽管华盛顿方面所采取的活动增加了西藏社会的不稳定，但中国政府的政策在该地区无疑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外界同情流亡藏人的声浪之所以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针对中国对藏人采取的各项政策，包括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对藏人的一些歧视行为，以及严厉压制那些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异议人士。每当中国政府阻止外国记者进入西藏时，便会导致外界怀疑中国政府试图在掩盖什么。

虽然中国的一些公开声明称赞自己的政策，例如最近中国国务院白皮书声称，“六十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²，但毋庸置疑，北京政府在全国以及藏人居住区都面临严峻的稳定问题。几个月前，全国人大宣布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预算（“维稳经费”）为 111.4 亿美元——超过来年的国防预算（106.4 亿美元）³。

在中国，有些人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但仍然指责其它国家。《中国日报》（*China Daily*）近日声称：“所谓的西藏问题是被一些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瓜分中国而制造出来的……”，西藏问题“纯粹只是一个被英国发明出来的议题。”如果这不是英国人发明的，那么就是美国人了⁴。解放军海军少将张召忠表示，在中国有超过 100 万名叛徒，包括外交官、经济学家和军事人员，他们替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从事间谍活动。⁵

最近，前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承认中国的政策存在失误：

目前，我国民族、宗教工作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不少。有一类问题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深刻变化引起的，总体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教育、管理、引导问题。

同时他承认，这些问题一部分的根源在于在中国政府本身，

消极的民族意识则表现为看不起、不尊重乃至欺侮其他民族，……汉族作为人口最多的民族，尤其要坚决同本民族的分裂主义分子作斗争，尤其要防止大民族主义。

他也回过头指责外国人：

还有一类是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崛起于当今世界，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实行渗透和颠覆。⁶

责怪外人可能在中国境内会引起一些共鸣，但它缺乏能够完全说服境外人士的证据。

中国政府对达赖出访实施的报复

在抵制达赖喇嘛和他的国际十字军方面，中国政府采用的关键方法之一就是威胁和打击报复

¹ Ibid. P. 11.

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国务院政府白皮书，2009 年 9 月 27 日，http://www.china.org.cn/government/whitepaper/node_7078073.htm（浏览于 2012 年 7 月 5 日）

³ “China boosts domestic security budget to face growing unrest,” 6 March 2012. <http://en.mercopress.com/2012/03/06/china-boosts-domestic-security-budget-to-face-growing-unrest>（浏览于 2012 年 6 月 1 日）

⁴ 把国内问题归咎于外界是一种普遍的倾向。例如，当广东省乌侃村村民向政府请愿反对他们非法征收土地，当时一名曾经被抓的村民回忆说，“我被一遍又一遍的拷问，村里的请愿是否有外国势力的支持。”Mimi Lu, “Wukan Protest leaders Releas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4 December 2011.

⁵ “Inside China: PLA hawks decry sellout by leaders,” Miles Yu, *Washington Times*, 20 Jun 2012.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2/jun/20/inside-china-pla-hawks-decry-sellout-by-leaders/print>（浏览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

⁶ 朱维群，“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学习时报》2012 年 2 月 12 日，http://www.studytimes.com.cn/2012/02/13/01/01_51.htm 在 China Policy 网站上的翻译，<http://brief.policycn.com/wp-content/uploads/2012/06/TEXT-A-few-thoughts-on-current-problems-in-the-field-of-ethnicity.pdf>（浏览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



其领导人会晤达赖的国家。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近说：“西藏问题是中国自己的内政问题，……中国坚定地反对任何外国领导人以任何形式会见达赖，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人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¹

事实上，除了警告外国领导人如果他们与达赖喇嘛会面将会遭遇中国政府的报复以外，通常这些威胁也总是会以某种方式付诸实施。

为了报复达赖访问蒙古，2002年，“中国对从蒙古进口颁布临时禁令，并封锁了连接两国之间唯一的铁路，……但进口禁令仅仅一天后就被解除了。之后，蒙古就再也没有以官方形式来正式接待达赖喇嘛，尽管他在2006年再次访问该国”。²

2008年，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holas Sarkozy）会见了达赖喇嘛，因此，中国取消出席第11次的欧盟-中国高峰会，同时取消购买150架欧洲制造的空中巴士客机作为报复。2009年，中国国务院温家宝总理的欧洲之旅故意避开法国，而到其他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因为“当我在飞机上看着欧洲地图，”引述他的话，“发现这次的行程是绕着法国走了一圈。……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什么”。³

对美国的报复没有那样严厉。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7月会见达赖喇嘛后，中国的反应比以往较为温和。经过3天的严厉谴责（“美国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消弭负面影响，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停止纵容寻求‘西藏独立’的反华分裂势力”）后⁴，这议题开始公开降温。

最近，英国利兹市被警告，如果他们欢迎达赖喇嘛，则中国政府将会把约200名在利兹市进行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培训的运动员转移至其他城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对于达赖喇嘛访问利兹市一事表示：“我们希望英方立即停止再次犯下损害中国利益的错误，尤其在最近一次英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的会面，中国与英国的关系都受到了影响，这个责任应由英方承担。”⁵

两个欧洲学者研究中国响应达赖喇嘛访问国外的宗教领导人时发现：

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各国只要以最高政治领导人的官方规格接待达赖喇嘛，中国就会透过减少他们的出口额以作为惩罚。然而，这种“达赖喇嘛效应”只出现在胡锦涛时代，而不是较早之前。此外，我们发现，这种影响主要透过减少出口机械和运输设备，而且只会在会见之后维持两年。⁶

他们研究了1991年和2008年向中国出口的159个国家，以测试这一政治会见如何影响中国的贸易决策，发现相关性最高的是在胡锦涛（2002-2008年）刚上任的第一年。

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负责人与达赖喇嘛会面，导致其对中国的出口平均减少了8.1%或16.9%，这取决于所使用的计算公式。这种影响主要是减少向中国出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而且在会面后只维持两年。⁷

从对报复行为的研究可以发现，达赖喇嘛访问后，接待他的东道国对中国的出口将平均减少

¹ “China protests David Cameron-Dalai meeting,” *Xinhua*, 15 May 2012.

http://usa.chinadaily.com.cn/china/2012-05/15/content_15300677.htm (浏览于2012年7月10日)

² Andreas Fuchs and Nils-Hendrik Kann, “Paying a Visit: The Dalai Lama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p. 11. (19 October 2010). Center for European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Paper No. 113. <http://dx.doi.org/10.2139/ssrn.1694602> (浏览于2012年7月12日)

³ “Premier: We all know why”, *China Daily*, 2 February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2/03/content_7440286.htm.

⁴ “China voices strong indignation, objection to Obama-Dalai meeting,” *Xinhua*, 17 July 2011.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1-07/17/c_13989714.htm (浏览于2012年5月6日)

⁵ “China's Olympic threat over Dalai Lama's Leeds visit,” *BBC*, 13 June 2012. <http://www.bbc.co.uk/news/uk-england-leeds-18421667> (浏览于2012年7月10日)。

⁶ Fuchs and Kann, p. 1.

⁷ *Ibid.*, p. 4.



12.5%，具体下降幅度取决于会见达赖喇嘛的官员层级，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会面平均将导致出口额减少 16.9%。¹

即使未能遏制达赖的绝大多数出访，中国政府的报复行动显然将继续下去²。自 1959 到 2009 年，达赖喇嘛已经造访了 62 个国家。从 1991 年至 2008 年，他已经进行了 266 次出访的旅程，其中 160 次访问了欧洲。除了印度以外（616 天），他出访美国的累计时间最长（在 2002-2008 年期间为 169 天），其次是日本（69 天）。³

中国政府的这些威胁声明和报复行动，并未能够真正影响达赖对美国的访问。第一个与达赖喇嘛见面的美国总统是老布什。随后，达赖又陆续会见了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与美国总统的会见前后共达 11 次。⁴

这些贸易报复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很牵强。北京一方面公开宣称自己反对外来力量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但同时又告知外国领导人：他们可以会见谁，不可以会见谁。这实际上也是在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事务。

而且中国政府在这样做时，也存在双重标准。最近，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告诉《纽约时报》说，中国反对北朝鲜政府推行的某些政策。当他被问及为什么中国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时，崔天凯回答说：“朝鲜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不是一个进行惩罚的问题”⁵。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于“惩罚”那些会见达赖的主权国家领导人一事，并不感到内疚。

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坚持这些行动。从正面效果来看，确实有少数的外国领导人因此而拒绝与达赖会面。但是，这些行动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要严重得多。因为每当一个外国领导人拒绝与达赖喇嘛会面时，便会替达赖取得巨大的宣传效果，并从该国民众身上获得同情和更大的支持。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无论见面与否），中国政府都把这些访问活动塑造成一个公共议题，反而替达赖喇嘛制造了媒体宣传的风潮。如果北京没有提出抗议，达赖的这些访问几乎得不到媒体的任何宣传，仅仅会有一小部分支持达赖喇嘛的人才知道他的来访。中国政府的这些抗议举动反而招致了民众中相当强烈的反华情绪，人们认为中国在用自己的强势去欺压一个弱小者。

中国政府的这些抗议无疑造成了中美关系中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因为中国每一次提出反对的抗议时，都为美国国会、媒体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反华言论的最佳机会。

此外，中国政府不仅在境外公开谴责和贬低达赖喇嘛，在境内也是如此。外籍人士也许会问，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感到一个僧侣是自己的威胁，境内藏人所看到的则是达赖如何勇敢地对抗北京政府。

如果达赖在中国领导人之前先去造访了某个国家，中国领导人就会取消对该国的访问行程，这实际上反而使达赖的影响力更加得以扩展。中国政府的抵制行动，反而给达赖喇嘛更大、更有效的影响力去干扰中国官员的出访。同时中国政府每次公开的抨击，反而会让中国境内的藏人更加感受到达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更加信任和支持达赖。

中国政府报复性的威胁也会导致某些外国领导人产生不满情绪，这通常会造成中国的外交困

¹ Fuchs and Kann, p. 17.

² 南非政府曾拒绝给达赖喇嘛入境签证让他参加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图图八十生日庆典。Lydia Polgreen, “Dalai Lama’s Visa Request Is Denied by South Africa,” *New York Times*, 4 October 2011. https://www.nytimes.com/2011/10/05/world/asia/dalai-lama-cancels-south-africa-visit.html?_r=1 (浏览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

³ Ibid., pp. 8, 16, 41.

⁴ <http://www.savetibet.org/policy-center/us-presidential-statements-meetings-dalai-lama-1991-2011> (浏览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

⁵ Jane Perlez, “North Korea Tests the Patience of Its Closest Ally,” *New York Times*, 24 Jun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6/25/world/asia/north-korea-tests-the-patience-of-its-ally-china.html?ref=opinion>. (浏览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



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希望自己被看作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才决定自己能够会见谁、不能会见谁。难道任何一个中国官员愿意让外国领导人来决定他们的会晤对象吗？胡锦涛是否会因为美国总统的报复性威胁而取消他与伊朗和叙利亚领导者的会晤？

因此，中国政府的每一次公开的抗议声明，都在替外国政客制造出一个新的国内政治议题。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觉得他们必须与达赖喇嘛会面，以此来证明他们不屈服于外国政府的压力。

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西藏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索。部分原因是一些美国媒体和国会议员坚持反华立场，他们把西藏当作一个棒子，象征性地用它打在中国头上，藉此来募集本国公民和社会团体的资金。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只要北京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政策持续造成当地社会的不稳定和恶性事件，只要达赖喇嘛仍然能够成功地实施他在各国的公关活动，只要中国政府的行为在客观上继续“帮助”他这样做，那么西藏在未来仍将是一个冲突的引爆点。

但是，假如在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能够达成某种真正的和解，那么西藏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这一和解将会为西藏地区带来真正的稳定。

【书 讯】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

马 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

目录

前言

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

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

“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

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 1939 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在革命背景下俄国和中国的“民族构建”路径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

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

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

如何思考 21 世纪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

加紧创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应对 21 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族群”概念的探讨

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

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与双语教育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附录

社会资本与少数民族发展——林南、马戎对话

全球化、本土性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访谈

学者的爱国情怀 ——纪念费孝通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